

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

——評任劍濤《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

● 陳華文

任劍濤的《建國之惑》以中國現代建國為特定視角，梳理中國近代以來的留學運動，進而闡明留學精英關於現代政治的正見與誤解，凸顯了作者如何理解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問題。



任劍濤：《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作為人類共同生活的一種方式，國家注定是一個久經不衰的研究對象^①。任何人在表達自己關於

國家的觀點時，實際上也是在表達人們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共同生活，以及國家與這種生活方式有怎樣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不同的學科實際上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敘述國家學說。這在當下中國語境中更為突出，很多學者或隱或現地闡述這種意義上的國家學說。任劍濤的《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以下簡稱《建國之惑》，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是其中頗有思想張力的一部專著，其論戰意味可通過副標題充分展露。

《建國之惑》以中國現代建國為特定視角，梳理中國近代以來的留學運動，進而闡明留學精英關於現代政治的正見與誤解。在此書中，作者鋪陳了蔣廷黻、錢端升等非經專制難以建國的謬論；丁文江科技救國的急功近利；當代留美學者以西方非／反主流方案反對西方主流方案的反諷意味；詩意化的德意志文化對於漢語學界的魅惑，等等。這些批判陳詞肯綮，在學界引起較

大反響。但如若僅將此書視為一部批判各國留學生諸多流弊的論戰之作，那麼將失其精粹，未能辨認出作者隱匿於書中的國家理論。筆者認為，任劍濤在對中國近當代學者政治觀點的批判中，凸顯了他如何理解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問題。

一 留學精英與現代國家構建的問題

作為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無論從神學、倫理或哲學的角度去理解，國家始終涉及政治秩序。根據傳統的文獻，關於政治秩序的來源有兩種最基本的範式：其一認為政治秩序是自然生成的，這一主張有古典的傳統。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是依循着人之政治本性而自然生成的，從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家庭到村落繼而到一個完全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可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時就形成了城邦^②；其二是基於古羅馬的現實經驗而產生的創建理論。雖然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分析希臘人在政治中使用的單詞“αρχη”時，認為該詞在作「權力」解時，同時具有「開始」和「支配」兩種意思^③，但是，該詞所包含的「開始」與古羅馬經驗的創建是兩種不同的圖景，前者的意義在於只要人們共同生活，權力都會作為一種潛在能力而存在，而且是與共同體的形成同時誕生的；而後者更強調創建者與新秩序的重要性，以及創建本身的權威。

簡而言之，這兩種建基於偉大經驗而總結出的進路，實際上也指

出了國家構建在邏輯上與事實上的兩種出路：要麼依循歷史進程的漫長發展而形成自足的秩序，要麼在開端時就為政治體創建起使之長治久安的秩序。具體而言，前者因應自身的歷史而發展，強調秩序的自生自發性；後者則強調秩序是一種創造或構建，而在一定程度上預設了一個起點，這個起點可以是某種完備的價值框架，也可以是某種指導性原則。政治秩序的自然生發性與人為創造性在時間序列上的確存有很大差異。如若以特定的現代政治結構來指定這種長治久安的秩序時，二者間的張力就會變得十分明顯，這種張力體現在國家構建問題中，就可以理解為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們所具有的歷史感與政治體的現代結構之間的衝突。這個問題對於被動地捲入現代性浪潮中的國家而言更為劇烈。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普遍將中國當前處境解讀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論斷清楚地表明，西方文明對中國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它基本上是所有中國學人不得不遭遇的命運，而關鍵問題在於如何理解這種命運。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發現《建國之惑》選取留學精英作為分析對象有其獨到之處。積弱的中國導致負笈求學的留學精英背負着救國的重任，而不得不糾纏於學術與政治的雙重導向之中，自覺或不自覺的精英身份認知總會促使他們胸懷祖國。因此，留學精英在求學的過程中，一方面遭遇着西方現代國家理念與制度的衝擊，另一方面又抱有古老強大中國重新復興的願景。因此，他們對現代政治的系統了解及其背後較之未

《建國之惑》在批判留學精英關於現代政治的諸種誤解中，直接面對西方理念與制度的衝擊，以一種並未闡明、也難言系統的方式消弭了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張力。

有留學經歷的普通公民遠為渾厚的歷史記憶，正是處理現代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問題極為恰當的研究對象。《建國之惑》在批判留學精英關於現代政治的諸種誤解中，直接面對西方理念與制度的衝擊，以一種並未闡明、也難言系統的方式消弭了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張力。

二 後發創制性國家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

通觀全書，不管是批判蔣廷黻等人在獨裁政治上構建現代國家的主張，還是反對以非／反主流制度安排抵制現代制度，《建國之惑》總體上認為留學精英對現代政治最大的誤解乃是，他們對自由、人權、憲政、民主、法治等現代建國基本觀念與制度安排準則的放棄。那麼，該書又是如何為這些被眾多留學精英放棄的現代價值辯護的呢？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現代價值是如何與中國相契合的？

《建國之惑》的討論從中國的建國處境開始，圍繞作為西方現代國家之典範的英國而展開，並在關於英國是否堪為中國之典範的討論中，將中國的建國處境解讀為現代指向與歷史斷裂中的後發創制性。如該書副標題所示，《建國之惑》各章直截了當地表明中國的建國問題是以現代為指向的。該書選擇了英、德、法、美、俄、日六個國家作為分析對象，此用意已較為明顯。這六個國家在近現代史上具有鮮明的代表性，而且對於清末彌留之際的中國而言有「列強」之稱。由

此，中國出路的現代指向不帶掩飾地呈現出來。

不過，《建國之惑》對英國的討論最充分地表現了一種獨特的觀點。該書將英國作為第一個討論的國家，這一選擇本身就是一種主張，而不是隨意的安排。首先，英國在西方近現代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無論從思想理念或制度設計，還是經濟發展方面看來，英國都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典範。《建國之惑》也從市場經濟、憲政體制和節制文化三個方面將英國確認為現代典範（頁47）。其次，該書從多方面梳理了近現代中國在尋出路時以英國為典範的諸多嘗試，並展開了英國是否堪為中國之典範的討論。

然而，在如何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這個問題上，英國與中國卻有着不同的命運。在任劍濤看來，「英國的現代建國觀念是極為複雜、漸變的結果」（頁78）。這是化解國家構建過程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問題的其中一個方式——英國並沒有遭遇中國所遭遇的文化衝擊。作者注意到，英國的現代政治秩序有其自身演進的邏輯，「是基於哈耶克所強調的自生自發的市場經濟秩序和憲政秩序而生成的第一個現代典範國家」（頁72）。將英國的現代政治解讀為長時間的歷史發展結果，並將之作為西方現代國家的典範加以確定，這實際上就設定了中國建國的最終處境：中國現代國家的生成注定是一種後發創制性的過程。作者以冷峻的筆觸勾勒出國家構建問題中兩幅不同的圖景：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一致與衝突。

現代指向並不只是一個時間序列的問題。在任劍濤看來，在現代

《建國之惑》各章直截了當地表明中國的建國問題是以現代為指向的。該書選擇了英、德、法、美、俄、日六個國家作為分析對象。由此，中國出路的現代指向不帶掩飾地呈現出來。

政治語境下討論國家，必定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他在另外一本書中將民族—國家視為現代政治哲學分析的首要問題：「一個民族—國家如何擁有一個特殊的地理處境、人口規模、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等支持自身運行的東西，如何在自己的政治傳統與『現代的』新傳統之間尋找一個維持自己存在與發展理由的東西？」^④民族—國家的現代語境必然導致尋求現代轉向的、後發的中國面臨着兩個問題。

首先，是「民族的」與「現代的」之間的張力。民族通常有着特定的文化認同，以及有其歷史習性，因而民族—國家的背景設定也就暗示着現代政治認知中的某種特殊處境：民族—國家必須面對自己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因此，一旦英國被確認為現代國家典範之後，中國「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英國建國的經驗，另一方面不得不化解自己國家建構英國式的現代國家對內部的張力，即自己國家內部存在的、排斥英國式建國的強大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因素」（頁72）。

其次，是「古典的」與「現代的」之間的張力。中國傳統的帝國形態與一種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現代政治必然存在難以彌合的差異，任劍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斷定「歷史的斷裂是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建國處境」（頁72）。由此，在任劍濤看來，中國的現代建國始終是一個古今中西的問題，因此，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衝突就將是中國尋求現代政治本身所必然包含的困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建國之惑》直接面對了中國政治所呈現出來的命運。英國作為現代國

家的典範，在一定意義上也即奠定了何謂「現代的」，然而這種「現代的」本身是自生自發的，歷經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因而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在英國的建國過程中是一致的，它們不存在傳統的斷裂問題。但中國以及所有後發國家都不得面臨的問題，則是現代建國過程中歷史與現代相悖的問題。後發創制性的國家如何建國？如何解決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問題呢？在這種建國處境下，有兩種理路較為普遍：一是因應歷史傳統回歸古典建國經驗；二是完全以西方現代國家為典範。不過，這兩種理路需要面對如下問題：

第一個理路要面對回歸古典建國經驗的可能性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相悖實際上只有在現代政治的框架中才會凸顯出來，如此一來，自然存在一種思路強調回歸古典。回歸古典的建國經驗如若真的能證成的話，那麼它的確能化解在建國問題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衝突問題。然而，任劍濤認為中國不可能回到古典立國經驗中直接發現現代建國的經驗教訓，也不可能回到中國曾經經歷的三個「建國時刻」——晚清的立憲建國時刻、民國的制憲建國狀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制訂國家根本法的時候（頁72-73）。

第二個思路所面對的是英國不堪為中國典範的問題。後發創制性國家都有一種模仿型建國的衝動，中國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政治發展是其中最為典型的證明，留學在尋求建國之際蔚然成風更是有力依據。但是，作為現代典範的英國卻不能成為各國模仿的對象，因為後發國

在任劍濤看來，中國的現代建國始終是一個古今中西的問題，因此，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的衝突就將是中國尋求現代政治本身所必然包含的困境。《建國之惑》直接面對了中國政治所呈現出來的命運。

任劍濤的建國哲學不要求回歸古典，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依賴歷史記憶。中西古今問題在他那裏仍然是最深切的內在關懷，也是探究中國建國過程中政治組織的恰當形式之理解模式。

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複製英國歷經漫長時間才生成的現代秩序。

實際上，任劍濤對上述兩種理路的拒斥彰顯出他關於歷史與現代的理解。中國既不可能回歸古典建國經驗，也不可能簡單模仿英國的典範，其主要原因是「中國自啟動現代建國進程以後，也就將古典的立國經驗與現代的建國積累混合在一起」（頁72）。他的理論脈絡並沒有簡單地將以英國為典範的現代國家所指向的政治形態進行教條式的推進，其敘述內含着現代語境下的歷史—政治的特殊結構。他沒有簡單取消了歷史在建國問題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種現代的歷史概念對政治形態進行新的理解。他未明言的，至少在這本書沒有明確闡明的，乃歷史概念是理解其政治哲學的關鍵。他並不是對我們稱之為「歷史」的東西完全敵視，而只是沒有採取傳統上對歷史的理解，從而將歷史視為一種典範之庫，一種需要回歸過去、可加以模仿的歷史。之於他而言，歷史不可能獨立於我們的經驗而存在，而是一種「活着的過去」或者說「現在的過去」。因而，他所理解的歷史具有不可逆性，是當下的、內在的，進而是現代的^⑥。

所以，任劍濤的建國哲學不要求回歸古典，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依賴歷史記憶，也正因如此，根據一般對歷史的理解，他就是反傳統的，甚至會有人認為他像是憑空在中國嫁接起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態。但與此看法相異的是，他將歷史視為一種過程，恰也是他為何認為英國不堪為中國典範的緣故。英國的現代國家建國經驗是其漫長的歷史

發展結果，這是後發國家所未能複製的。雖然他指出中國在民族—國家與帝國形態之間存在一種歷史的斷裂，但顯然他在這裏所謂的「歷史」就是一種作為事件的過去，這種斷裂的存在表明這樣一種事實已不再具有回歸的可能性。所以，略帶弔詭地，歷史的斷裂表明了其不可逆性。然而，作為一種過程的歷史概念，卻可以作為一種活的現在而為人所把握。我們再一次發現，中西古今問題在他那裏仍然是最深切的內在關懷，也是探究中國建國過程中政治組織的恰當形式之理解模式。

因此，《建國之惑》明確指出，中國當前的建國處境遭遇內外雙重掣肘，既無法純粹模仿英國的現代國家建國經驗，又無法回歸自己古典的建國時刻。然而，因作者對歷史概念的現代理解，從而體認到中國自現代轉向以來，已經將這兩種建國經驗混合在一起。這意味着中國當前既不是要重新回到近現代統一建國的歷史原點，也不必着意照搬一種英國化的政治秩序，因而對於當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在自己建國過程中不斷前行的過程，它指向某種現代的政治平台。

三 歷史—政治敘述中的自由憲政指向

在中西古今歷史中界定建國處境的理路本身並不能稱為罕見，但這恰好說明現代指向與歷史記憶是中國在建國問題上的重要處境，這是任何人都無法迴避也難以遮掩的事實，也是中國學人必須面對的命

運。由於任劍濤將歷史視為過程的現代理解，以及其對政治學之經驗品格的體認，因此《建國之惑》沒有簡單地推進所謂西方的「現代政治形式」，而是在一種現代的歷史—政治敘述中展開對於中國建國的討論。這種敘述沒有將中國現代政治的歷史—政治狀況推到中國古典的建國經驗或近代以來出現的三次建國時刻中去，也即不是簡單地追溯某一種固化的傳統，或完全重新回到某一個原點，而是強調現代建國在中國已經以不可逆的形勢被啟動，在這個過程中，中西建國經驗已相互混合，無論是以傳統掩蔽現代的模式，還是以現代取消傳統的理路，均有悖於中國現代政治推進的歷史—政治現實。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現代國家構建具有特定的理解模式？換言之，現代政治本身是否也內含着特定的理論範式？怎樣的思想進路才能最恰當地闡釋何謂「現代政治」呢？這個追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它

直接回應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為何留學精英如此容易放棄現代建國的基本價值觀念與制度安排準則？任劍濤通過清理漢語學界的德國魅惑，彰顯出對政治哲學進路的強調，並在政治哲學的進路中對現代建國的基本價值予以確認。《建國之惑》通過思想史的敘述以及心理學的分析，爬梳了德國政治思想及其之所以在中國獲得普遍青睞的原因。

任劍濤認為，從理論形態上分析，德國對中國發揮影響力沿循了一條從哲學、政治哲學、政治詩學到政治神學的理論流變路徑。面臨着複雜的現代轉向，德國人遭遇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從而形成了一種「救心」與「救國」的雙重心理結構。德國人「被迫」進行哲學上的玄思，而德國思想家服從權力的習性導致他們不能直接言說政治。正是這樣的心理結構以及特殊語境下的習性，導致政治哲學在上述四種關於政治的敘述形式中，極其容易滑

關於建國問題的政治哲學理路意味着現代國家的構建有着特定的主題，任劍濤所主張的實際是在世俗公共領域，也即現代政治領域內，不訴諸神學與詩學，而建立起獨立的、內恰的政治哲學。



《建國之惑》爬梳了德國政治思想及其之所以在中國獲得普遍青睞的原因

關於歷史—政治結構中的現代指向，《建國之惑》多處直接指向自由憲政框架，尤其在梳理留學生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清楚表明這正是作者對現代政治的價值取向與制度確信。

落為哲學—詩學—神學的理論形式。在任劍濤看來，哲學—詩學—神學的敘述結構貌似是非政治的，但對於現代政治構建可謂「飲鳩止渴」：「政治要不隱匿在哲學思辨的雲遮霧障中，要不躲藏於詩學的激情四射裏，要不就掩蔽在神學的隱秘思考當中。」（頁108）

顯然，在任劍濤那裏，思辨的德國哲學走得太高而略具不食人間煙火之意，而政治詩學的敘述則將政治的哲學致思轉化為詩性感知，頗具浪漫色彩而未能留意到政治更為現實的、也更應嚴肅對待的冷峻面孔，同時政治神學不過是對政治基本價值的絕對化證成。任劍濤關於政治哲學理路的主張因而在對這三種敘述方式的拒斥中得以彰顯。實際上，關於建國問題的政治哲學理路意味着現代國家的構建有着特定的主題，任劍濤在書中也間接地提及政治哲學所應該關注的是自由、公正、平等、憲政等（頁99）。

結合任劍濤對上述三種敘述方式的拒斥，我們可以發現，他所主張的實際是在世俗公共領域，也即現代政治領域內，不訴諸神學與詩學，而建立起獨立的、內恰的政治哲學。在現代政治中，個人的東西被分離出去後，政治成為一個公共的空間，因而可以而且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實際是對政治的規範與落實。這種政治不再是個人在其中尋找意義的實體。神學、詩學的政治則仍舊保留着政治的人格特徵，個人對政治抱有信念，要在其中尋求某種意義、永恆不朽或詩意安居。這對於一個規範的現代政治結構的建成，本身不一定具備反政治的色彩，但如若以哲學玄思、詩性感知、

神學敘述代替政治哲學的思考，那麼現代政治所具有的那些特定結構就無從彰顯。

從思想史的角度上看，隨着中華文明的主體意識逐漸顯現，「現代」竟然成為一個讓很多人羞於直面的概念。現代在過去與將來之間的內部張力直接且錯誤地被替換為中西文明的對峙。不可否認，「現代」以及與其相關的一系列概念，不僅出於西方世界，而且有着鮮明的西方文明特徵。留學精英奮起直追的心理帶有不少積極意義，然而在文化上的不自信反而極易導致將本來於己有益或正當之事物簡單視為異己而加以否定，這自然又是一種狹隘的表現。

現代政治雖帶有西方印記，但它是否完全是西方的而不適宜於其他任何文明，這本就是一個可深入討論的問題。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為甚麼《建國之惑》特別提示人們要注意詩學政治與神學政治的德意志語境，這與前文對任劍濤的歷史概念的理解一致，現代政治的經驗品格也再一次被揭示出來。實際上，任何思想本身都有着明確的本土語境，二者不能隔離。這意味着，不能抽離德意志語境而單獨理解德國思想。因為德意志政治在現代政治實踐上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德意志思想所具有的反現代性實際上構成一種警示。以反現代性來概括詩學—神學的政治敘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澄清現代政治，從而看清這當中泥沙俱下的「問題」與「現代」的關係。故此，《建國之惑》在各種所謂「現代思想」中的爬梳，也有澄清現代政治之意。正如德國思想具有明顯的德意志語境，

中國現代政治結構也有其獨特的中國語境。

歷史記憶可以是一種美好想像而成為黏合社會的力量，但同樣也是一種蠱惑，迫使人們耽溺於過去，而忽視了對當下的清晰認知。正如《建國之惑》所揭示的，大多數留學精英在心理上具有一種超越與學習的悖謬，如此悖謬導致留學生產生對於中西歷史的時代錯覺，影響了他們在知識系統上的選擇性吸納，最終造成了中國在現代轉型中向何處去的盲視。留學生愈是自覺到自己身上關於中華文明的歷史印記，這種悖謬就愈是明顯。因此關鍵的問題還在於如何妥當地敘述歷史，將之作為理解政治的其中一個模式。實際上，現代指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借助於將歷史視為過程而獲得逐步的呈現。關於這種歷史—政治結構中的現代指向，《建國之惑》多處直接指向自由憲政框架，尤其在梳理留學生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清楚表明這正是作者對現代政治的價值取向與制度確信。

《建國之惑》並沒有對自由憲政進行過多的闡述，但作者的確是基於此框架而直陳留學生的建國之惑。自由憲政的現代國家形式的確帶有鮮明的西方色彩，但根據前文的闡述，此種政體的歷史—政治狀況已為中國當前的建國進程中所承接，除非強行區隔中國現在的建國經驗裏的古典因素與現代因素，否則現代指向中的自由憲政框架就應該獲得認可。這種闡述或有待深入探究，但已經顯示出任劍濤回應了中國國家構建的難題呈現給所有中國學人的命運，而不是迴避。更重要的是，在任劍濤這裏，歷史—政

治的政治哲學結構並不依賴於詩性感知、也不必對應某種絕對化的結構，包括哲學的形而上學結構，以及神學概念的政治化。

然而，中國建國進程中所直接理解的適當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在歷史—政治的政治哲學結構中獲得充分的展示？在這個敘述過程中，它所具有的歷史進步的信念特徵若隱若現，當然這也是自由憲政主義的一個古典傳統。不過，這畢竟不是該書的主題，對此未有充分闡述與澄清也是情理之中。總之，有意或無意地，《建國之惑》關於現代國家構建的歷史—政治敘述，多少會引發讀者進一步去思考，自由憲政主義的進路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消弭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之間的張力。

《建國之惑》關於現代國家構建的歷史—政治敘述，多少會引發讀者進一步去思考，自由憲政主義的進路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消弭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記憶與現代指向之間的張力。

註釋

- ① 鮑桑葵 (Bernard Bosanquet) 著，汪淑鈞譯：《關於國家的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46。
- ②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4-7。
- ③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著，孫傳釗譯：《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57。
- ④ 任劍濤：《政治哲學講演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4。
- ⑤ 任劍濤：〈論現代公共與古典公共的不可逆關係〉，《思想戰線》，2009年第3期，頁32-37。

陳華文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博士後